



贝贝特学术经典

欧洲思想史

Europäische
Geistesgeschichte

[奥地利] 弗里德里希·希尔 著 赵复三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坊间欧洲通史以政治或哲学思想史为多，前者以王朝或地域为中心，且重点以西欧为主，后者则重视个人思想贡献为多。《欧洲思想史》可以补以上之不足：作者以宏观的史学视野来讨论欧洲历史的渊源，其中包括基督教思想的形成以及后来与伊斯兰教思想的糅合，追寻近代欧洲思想的起源，为今日“全球化”格局的思索提供思想资源与历史经验。

本书特点

- ◎ 哲学史与社会思想史兼而有之，深入到欧洲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社会角落，重视知识界精英思想与下层民间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渗透。
- ◎ 打破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观，关注中欧、东欧、西班牙以及西北欧的低地国家的思想与文化，重视西欧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思想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互动，揭示今日欧洲思想史格局的历史渊源。
- ◎ 突显阿拉伯文化和希腊异教文化对整个欧洲思想文化形成的作用。
- ◎ 为我们了解整个欧洲文化的地区多样性与历史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从而突破了按照时代先后发展的线性式思想史的局限。



ISBN 978-7-5633-6393-3



9 787563 363933 >

ISBN 978-7-5633-6393-3

定价：58.00 元



贝贝特学术经典

欧洲思想史

Europäische
Geistesgeschichte

[奥地利] 弗里德里希·希尔 著 赵复三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德文原著 © [奥]弗里德里希·希尔(Friedrick Heer)

中文版 © 香港中文大学 2003

本书中文繁体字版译自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urope
(Europäische Geistesgeschichte)1953年出版由 Friedrick Heer 著。
本书中文版原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并拥有所有版权。
本版限在国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思想史/(奥)希尔(Heer, F.)著;赵复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633-6393-3

I. 欧… II. ①希…②赵… III. 思想史-欧洲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08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40 字数:600千字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译者前言

四十多年前,我敬爱的老师、中华圣公会会长徐怀启先生有一次语重心长地说:“人只有在默默无闻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做点学问。”这话似乎抱着期望,又含着责备,使我此后长时期里,经常“内自讼”,觉得对不起老师。1982年徐先生去世,对西方哲学具有渊博知识的他却因生不逢时,留下不多著作。每当悼念老师时,就更加自责。大概是1985年,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感到要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考察,在西方哲学史领域,汪子嵩先生承担了古希腊哲学史的编写工作。汪先生是陈康先生的高足,对希腊哲学功力很深,道德和学术见解都是我素所敬仰的。不知怎么,欧洲中世纪哲学史的编著任务落到了我头上,怎么推托也不行。那几年行政杂务缠身,只从欧洲一些大学图书馆搜集了一批国内难找的资料,与一些师友作些讨论,进行准备工作。1989年移居国外,知道国内学术人才济济,这个缺口很快便能填补,无待杞忧。但就自己来说,已经许诺而没有做,欠下了一笔学术债,就像影子一样,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自觉此生若不偿还这笔债,就是死也不会得到安宁。

与此同时,自己心里还有另一个多年的迟疑。欧洲中世纪哲学史在西方有不少可读的书,有些如艾提昂·伊尔松(Etienne Gilson)的专著,其学术地位是西方学术界所公认的。但在今日西方,高等教育已日渐沦为职业技能培训,“中世纪学”比哲学更加冷僻,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对文化传统不同的中国年轻一代来说,究竟有多少需要呢?自己的答复是:又不是急需,又不无需要。如果把欧洲中世纪哲学史放在古代一千年(主要是希腊)哲学史和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直至近现代五百年哲学史的中间,人们的兴趣大概会关注于两头。中间那一千年涉及大量基

基督教哲学,从内容到使用的语言都会使现代人感到枯涩,采用的逻辑推理方法也会令现代人感到繁琐。有些朋友对西方哲学史的中世纪时期,采取一种“一笔带过”的“走过场”态度,这也是无可苛求的。难得有人去探究,中世纪唯名论、实在论之间看来繁琐的争论,恰恰是欧洲哲学从古代关注的宇宙论、本体论转变到近代关注的认识论的中间环节,究竟怎样转变的,正应是研究重点。也难得有人对8世纪以后希腊—阿拉伯思想文化为文艺复兴运动所作的思想准备,和文艺复兴实际继承了多少中世纪传统做认真的研究。12世纪以夏特(Chartres)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文化复兴,七十年来在西方的研究进展并不是很大,在中国则夏特大教堂更不引起注意。在西方,史学界对欧洲中世纪,特别是它的后期,在塑造今日欧洲精神面貌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开始重视了;在中国,欧洲历史显得比欧洲更加遥远,人们似乎多少还受几百年前西方把中世纪看做“黑暗时代”的影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欧洲中世纪哲学史也已有一套模子,在这模子里不论怎样推陈出新,总脱不出窠臼。这样的欧洲中世纪哲学史,如果青年人没兴趣,也不足为怪。

但另一方面,21世纪标志着世界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现在各国大众的交往增多了,无论在中国、西欧或北美,都可以感到各民族大众之间的思想感情沟通,十分不易。中国不少人的世界知识似还远远跟不上开放形势的需要。展望21世纪,迫切需要加强对世界各民族文化,首先是对西方的了解。现在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文学、哲学等各学科的,对晚近西方在这些领域里的名家专著,已渐不太陌生。至于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这条道路究竟怎么走过来的?似乎应该是欧洲史的任务去从事介绍。但读欧洲史时,往往只见连绵不断、变化无穷的树木(历史事件),而不见森林。英国史学家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认为,写历史若不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则历史不过是一堆史实的排列,成为剪刀、糨糊的工作了。这大概也像交朋友,若只认面貌不知思想,是很难算作朋友的。克罗齐强调历史就在现实之中,读思想史的学生对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并接受,因为在他的书架上,柏拉图的《对话录》、孔丘的《论语》、释迦牟尼的鹿苑讲道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杂然并存,都在他的手边。但是,从文化史角度看,“历史在现实之中”恐怕还有更深一层含义,是指在一个民族中经常起作用的文化心理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

但思想史又不同于哲学史，哲学研究通常限于高层次文化的小圈子，不是大众的事业（虽然大众并不是没有哲学思想），因此哲学史的著述通常着重不同时代，从思想到思想的继承、发展，比较抽象。思想史却必须探求每个时代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交相作用，这既是思想史与一般哲学史的区别，又是它和一般历史著作不同的地方。从对西方文化史感兴趣的读者的需要看，思想史比哲学史可能更容易引起兴趣，也更有意义。究竟做些什么，对中国读者了解西方可以有用呢？这是自己心里反复思想的问题。

但写作欧洲思想史的难度似乎更大。第一因为它要把哲学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考察发展的线索和相互作用。第二是语言工具问题。外国人研究中国思想史比中国人研究欧洲思想史容易，因为外国人只需要掌握古代汉语这一种语言，在语言工具上大体可以够用；而研究欧洲思想史，仅仅近现代语言，便有拉丁语系、日耳曼语系、斯拉夫语系的不同，中古时期除拉丁文外，还有古哥特文、古斯拉夫文等；各种语言的文献浩如烟海。第三，最难的是对各种历史事件和围绕它们的各种对立思想的错综复杂关系怎么作出恰如其分的估价，往往在学者间并无定论，各国学者也难免带有民族历史的成见。这即使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也是皓首难穷的工作，遑论是来自另一个文化传统的人了。因此，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思想史的介绍，比哲学史更难以开展。

正是在这种苦恼之中，读了维也纳大学思想史教授弗里德里希·希尔的巨著《欧洲思想史》，高兴地觉得这正是我要找的。希尔教授的《欧洲思想史》有几个难得的特点：

（一）在通常的西方哲学史著作中，我们所接触到的，往往只是知识界少数思想家的思想。希尔教授却时刻注意到各历史时期中民间的思潮，它们与“上层文化”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连接的。这里涉及欧洲的历史。从1世纪到6、7世纪间，许多原在中亚的民族经过巴尔干半岛北部，以不同路线进入中欧、西北欧，其中到西欧的有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法兰克人、阿勒曼人（迄今法国人还称德国为阿勒曼）、日特人（今丹麦人）、撒克逊人、伦巴人等；在中欧的有马扎尔人（今匈牙利人），向西北欧北上的马扎尔人分支民族则成为芬人（今芬兰人）。这个民族大迁徙的历史，至今还不是很清楚。巴尔干学在欧洲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之一也正在此。这些民族（到欧洲定居后，形成分散的小农经济和领主统治）有各自的异教文化，经过几百年才逐渐接受基督教文化。这个过程大体到10世纪还未完成，



这是欧洲中世纪前期。自11世纪后欧洲经济、文化开始迅速发展,到12世纪形成繁荣时期。这时在法国、德国兴起大教堂学校,在意大利兴起城邦学校,青年人游学四方,成为新知识的传播者。他们所获得的文化知识包含不少古代的异教文化,也包含东方的非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会虽然并不赞成,但在12世纪时自身还未感受威胁,因此在文化教育上还持开放态度,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见解、不同思想都能互相容纳。13世纪之后,罗马教廷与社会大众的新思潮矛盾逐渐尖锐化,发展到设立异端审判法庭,对犯有异端罪的人严酷镇压。这时上层与底层的文化破裂,但即使此时,在代表上层文化的基督教会内,还有不少人同情接受底层文化,在对立之中还有互相渗透。希尔对欧洲历史有精湛的研究,因此,本书的视野不仅限于少数思想家的小圈子,而是深入到欧洲社会的广阔天地中去,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二)通常的西方哲学史著作,往往以西欧为中心,在西欧也只集中注意德、法、意、英四国的思想界,对于中欧、东欧、西班牙、西北欧的低地国家等都很少涉及。希尔教授来自中欧奥地利,使他能容易地看到欧洲的整体。其实,直到13世纪初,欧洲还大体是一个联合的大社会,甚至两国国王交战,民间贸易往来依旧进行,各国间的边境还不曾十分明确固定。例如,在11、12世纪间,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一条国际商路,经过俄罗斯中部的诺沃格洛,直延伸到拜占庭。诺沃格洛的12世纪大教堂的拱门出自德国工匠之手,便是一个明证。不仅如此,直到蒙古人西征和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之前,俄罗斯与西欧还有频繁的商业往来和皇族联姻。只是自14世纪中叶起,欧洲各国的边境才固定下来,一直沿袭到19世纪中叶,甚至有的地方沿袭到20世纪。希尔教授这本书突破了西欧中心观念,例如与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同时,在东正教、俄罗斯正教会内,希腊人马克西莫斯的活动,同样值得重视,而这在许多关于宗教改革的专著中都付阙如。

(三)希尔在突破传统的西欧中心观念时,不仅把东欧思想的影响包括进来,而且把阿拉伯文化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南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作用突现出来。这就把欧洲思想的历史放到当时的世界中去考察,使读者呼吸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清新空气,并看到从7世纪到15世纪,当时亚欧大陆几个主要的文化系统——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拜占庭、西欧——通过彼此间的交流,都得到显著的发展。

(四)就欧洲来说,上述三方面是结为一体的。希尔着力指出:欧洲东部有它

自身的传统,与西部的文化传统在矛盾中互相渗透;南部地中海世界受希腊异教文化、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在向西北欧、中欧扩散时又不断互相激荡。

在这个总体的格局之中,每个地区的文化思想有它自身的发展,不断汇入整个欧洲思想发展的洪流;每个历史时期又大致可以看出,有一个地区隐然成为欧洲思想的中心。如果12世纪时巴黎成为欧洲文化思想最活跃的中心,15世纪意大利又走到了前列,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震撼了西欧,17世纪上半叶在巴洛克时期中,西北欧低地国家又走到了前列。在这过程中,处在欧洲边缘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英伦三岛的学术文化又对欧洲大陆的文化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而在每个地区,每个社会里,下层文化比上层文化较易接受外来影响。这些不同的文化之间通常是沟通并连接在一起的,若是这种联系破裂,就不免伴随着动乱。它为我们了解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钥匙。

这些特点使我觉得应该把本书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同时也正由于它的特点,又不禁顾虑它对中国读者的可读性。本书即便对现代西方读者来说,也不是一本很容易读的书。作者在其他专著中有较详尽发挥的题目,在本书中就处理得较为简略。因此,几乎可以说,本书作者假定读者已经有欧洲历史、基督教史和欧洲哲学史三方面的知识,然后读这本书。对欧洲读者来说,如此要求,已经相当不易,特别是后两方面,一般大学研究生也未必系统读过;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难度就更大一些。但又想,本书属于通史性质,迈过这个门槛,再读断代的思想史如波兰裔英国学者布洛诺夫斯基(J. Bronowski)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与哲学教授马兹利许(Bruce Mazlich)合著的《近代西方思想史》(*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或专题史如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的《西方人文主义史》(*History of Humanism in the West*)等,才不致茫无头绪。如想踏进西方思想史领域,这个门槛总是要迈的。当人文学在消费主义推土机下受到冷落的时候,向好学的青年朋友推荐一本好书,或者还是有意义的。

推动我翻译这本书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学术界,思想史是一个比较少有人问津的领域。侯外庐先生等多位学者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是一部拓荒性的著作,功不可没。近年来读到一些中国历代思想家的评传,觉得比“文革”以前出版的同类书,在体裁上有所创新,令人高兴。由此想到,我国学术界有志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同人或者也有兴趣了解欧洲的思想史研究情况。

在欧洲,思想史研究或许应追溯到黑格尔。他对近代欧洲思想界的深远影



响,不仅限于哲学,还伸入社会理论、历史、美学等领域。他认为有一种世界精神,或称作绝对观念,在历史中运行、发展并自我实现。因此,在他看来:(一)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精神的历史;(二)人类的精神历史有它明确的发展方向,即不断趋于世界精神的体现。同时,在《美学》一书中,黑格尔提出了民族性和时代精神这两个重要的观点,认为它们是绝对精神在贯穿历史的进程中的暂时形式。19世纪下半叶,雅各布·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1860年出版)就是不自觉地沿黑格尔标出的研究路线,着手具体的断代文化史研究的结果。真正开创现代历史学所称为思想史研究的大概要算德国文化历史学家威尔海姆·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由他开始的德语文化历史学派,接过黑格尔思想中“文化的结构统一性”这一点,由此出发研究文学艺术和社会结构、世界观之间的联系。

但是黑格尔思想体系中那种全能的形而上学辩证运动,使一切历史事件都成为既定之物,构成一个完整却封闭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盛极一时,进入20世纪却引起了“非黑格尔化”运动,引起文化历史学派的分化。在西欧,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英国的汤因比(Arnold Toynbee)大体还沿着黑格尔思想从事文化历史研究。在英国和美国(所谓英语国家),居主流的文化历史学家们都极力摆脱黑格尔思想影响,他们似乎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认为在历史中没有什么单一的目标、发展模式或任何历史必然性,更不用说可预见性;像英国的历史学家科林伍德、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由奥地利改籍英国的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都持这一观点。另一个共同点是否定历史的进步,认为人类历史是盛衰并存的历史,进而反对相信“历史进步”的观念。如思想史专家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在所著《存在的长链》(1936)中指出,进步这个观念在18世纪时是和修道僧的宇宙图像融合在一起的,其中从石头上升到植物,而后到动物,直到人类,然后通过不同等级的天使,最后抵达至高的神。于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被扫入神学范畴中去了。卡尔·波普更明确宣布,反对相信进步的观念,但又反对历史悲观主义。在这种观点中,一般历史还可能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因为事实不得不如此;但任何专题史就不一定能保有任何历史的内在逻辑,它的前后时期之间能有跳跃、能有断层。这些观点与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反理性主义思潮是不可分的。本来,哲学的兴起是由于人要求了解自然、社会和自身,发展到当代,其重点转向征服自然世界,而

对人与社会,特别是对道德价值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趋于相对主义。这种思潮使得历史研究在一个时期内倾向于搜集资料数据,钻一些细小的题目,对历史的宏观研究渐渐销声匿迹了。

近年来,至少在欧洲,文化史的研究又逐渐回升。

就我所知,以西欧、北美对法国历史的研究为例,在1976到1990年间,以法语出版的法国历史书籍,属于政治史、外交史方面的书籍数量减少了约四分之一,属于社会史、经济史方面的书籍数量减少了一半,而思想史、文化史方面书籍数量增加了一倍。在此期间,以英语出版的法国历史书籍,属于政治史、外交史方面的书籍数量减少了一半,有关法国经济社会史的著作减少了约四分之一,而有关法国思想文化史的著作却增加了一倍。^①在近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史学界的这种变化并不是钻冷门的一时热,而有它的内在原因,一是对于用经济原因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经济社会简单化”(socio-economic reductionism)方法,感到难以使人得到满意的历史说明。二是左翼历史学界受意大利格兰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狱中手记》中强调文化作用的思想影响。在法国,在年鉴学派内部,年轻一代史学家对老一代学者像布罗代尔(Braudel)提出的“历史经验包含有不同层次”这个理论框架提出怀疑,而转向强调文化心理(mentalites)不是“第三层”历史经验,文化不是处于某一层,而是在历史中对经济社会关系有重大影响的一种力量。文化并非仅仅被动地受经济社会所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能动的相互作用关系,不能用因果律来硬套。在这一派学者看来,人的理性活动脱不出特定的文化环境,因此,一种社会理论以及表现这种社会理论的组织及其活动都脱不出它所产生的那个文化环境。现在回顾,近四十年来,由于美苏对峙的世界形势,西方的社会研究偏重当代、偏重政治、偏重实用,方法上偏重微观;因此思想史领域的有限研究也偏于政治思想,从社会文化角度宏观研究西方思想历史的成就较少。连美国全国人文基金会前主席林恩·V·钱尼夫人也早在1988年向国会的报告中认为,美国人文学科陷于“危机”之中,由于学术“政治化”(politicization),使学者感到被“孤立”和“精神混乱”。^②在欧洲,学术界的传统较为深厚,对政治冲击的吸收能力

^① 托马斯·J·谢泼:《在大西洋两岸写作的法国历史:一个比较分析》,载英文《法国历史研究》年刊第17期,1991年,第242—243页。

^② Lynn V. Cheney: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e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Humanities in America", 载1988年9月21日《高等教育纪事》杂志A17—A23页;上引文见A18页。



较强,随着冷战的淡化,学术发展的自身要求也就较早地表现出来了。希尔教授是老一代的欧洲学者,他的这部《欧洲思想史》所挖掘的深度与广度,较好表明了这个领域里已有的研究成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中国的思想史研究或有可供参考之处。

书大概有三等:第一等书的作者博学深思,治学谨严,言必有据又富有创见;第二等书的作者治学谨严,爬梳甚勤,而创见不多,但仍不失为好学者;第三等则志大才疏,立论轻率,厕身书林,徒供鉴戒。读书大概也各有不同,一种是细读深思、反复玩味、举一反三的;第二种是读完之后得其要点,而后放在架上随时备查的;第三种是浏览一遍,便可放下的。这也随读者的志趣、需要而各异。

本书的翻译工作,从酝酿到具体着手,也是生活从漂泊到稍稍安定的结果。自1991年开始做起,为求译文能较好表达作者原意,又使读者较易了解,常常斟酌费时,甚至原书一句话的翻译,要斟酌一小时。对罕见的人名、地名、事件本末也较费事,因此一天至多只能译出三千字光景;加以是在授课之余和假期中进行的,不免时断时续,进度很慢,历时四年才完成,常常为此惭愧;但它又仿佛把自己带回不知折腰事功利的求学时代,给人宁静和喜悦。

大学的澳克校长、克拉克副校长同意我减轻课时,同事们的支持,图书馆的协助和朋友们的鼓励,都给了我力量,谨在此深致谢意。

译者自知水平有限,译本书时常感不足,但仍不揣冒昧,从事移译,是求其友声,寄希望于后来者之居上。原书注释均以[]记号标示,附于书末;为便利读者,译者所作译注则以○记号标示,附于各页下端。译文中有错舛不当之处,敬祈海内外读者专家指正。

最后谨以此译著纪念我的老师、已故中华圣公会会长徐怀启博士,我的兄长、已故中华圣公会郑建业主教。

译者

1995年1月

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市大学

英译者前言

为把弗里德里希·希尔的巨著移译成英文,有一些特殊的困难。这可能也将成为读者阅读本书时的困难,因此,我想陈述一下我感到的困难之点。首先,希尔教授并不认为思想史是按时代前后单线式发展的历史。他认为在历史上曾起重要作用的思想,具有类似辐射性的影响,不是仅靠简单叙述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就能予以充分说明的。于是,他采用一种不寻常的甚至有些人会感到难以同意的办法,来处理这些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本书的结构,虽以时代为纲,却是螺旋形发展的;因为前面讨论过的重要思想和重要著作,在后来的世代中与后来的思想相互交织,并以不同的方式相互渗透。一位现代读者的书架上,并排放着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阅读时,他既与奥古斯丁对话,又与康德对话,就如同他们都是同时代人。这是希尔教授的思想的一个特点。为帮助读者适应这个特点,译者把德文版的《后跋》移作英译本的《作者前言》,其中,希尔教授列举了一些基本的主题思想,都是他认为在欧洲思想的矛盾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

第二个困难是由于本书只是希尔教授许多著作中的一种。本书中涉及的问题,有些是希尔教授在他的其他著述中已经详细讨论过的问题,因此在本书中就没有深入讨论。我希望,希尔教授的其他著作也能陆续译成英文,使对本书内容感兴趣的读者,能进而阅读希尔教授的其他著作。

第三个困难是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如何选择。希尔教授深信,思想往往引起爆炸性的影响,因此,必须十分严肃地对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思想是炸药,它的传播又不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欧洲的思想会在其他大陆引起爆炸性后果。这确

实难以否认。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思想,给予多少篇幅来叙述分析,就成为见仁见智的一个难题。一个美国或英国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不理解,为什么有些自己认为重要的题目,却叙述得比较简略,而有些自己不熟悉,但对其他地区很重要的问题,倒叙述较多。这是任何作者来写这样一本书时都难以避免的;同时,这也是本书有价值的地方,因为它的选材和处理都独具一格,不落俗套。

希尔教授写作本书时,欧洲正处于冷战高潮之中,奥地利被东西方四国分割,维也纳也一样。希特勒时代,纳粹党曾经逮捕希尔教授,毁了他的许多手稿。1946年,他又被苏联占领当局错捕。希尔教授是在与疾病和失望心情作斗争之中,一切从空白重新开始来写作本书。但他努力以学者的宏观态度,从欧洲的悲剧历史中找出一个思想线索,这是希尔教授写作本书的推动力量。希尔教授真诚地相信,对我们时代的各种巨大运动,只有坦诚地讨论,摆脱标语口号和僵化观念的影响,才能理解。持不同以致相反意见的双方,要听对方讲话,并懂得对方何以这样说,然后自己所讲的话才不是空话,然后才能有真正的讨论,而不是争吵谩骂。当欧洲致力于克服自身的分歧并且要和世界其他地区相处时,希尔教授的这本书向我们提供了回顾过去、展望将来的一种新的角度。

最后,我还要向希尔教授表示谢意。由于他的热情帮助与合作,使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得以大大减轻。

约拿单·许泰固堡
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

作者前言

欧洲重要思想的历史不是像一条线那样顺序发展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些思想在欧洲的精神地图上像重叠的光环那样铺开。在这篇前言里,我想掣要举出一些题目,据我看来,这些题目在欧洲历史中反复出现,直到今天,还未失去它们的意义。如果哪位读者首次看到它们是它们穿着现代服装的时候,那么再在本书中看到它们时,或者不难辨认出来。这则前言只是为读者阅读本书时充当导游,而不是为那些重要的思想主题作诠释。在试图对它们作较为系统的介绍时,我只想强调一下它们的重要性和在欧洲历史中的延续性。

(一)在欧洲的精神历史上,从来都存在着“上层”和“下层”的斗争。“上层”文化包括基督教、有教养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始终与人民群众的“下层”文化进行着斗争。这个文化的“底层”包括人民群众个人的深层人格和大众的风尚、信仰、生活方式等。从19世纪到1945年这个时代的结束为止,这种斗争又进入一个新时期。来自底层的运动第一次突破了上层文化的表层。这些运动,无论是理性或非理性的,灵性主义或自然主义的,都带着巨大的热情,甚至是狂热。这些运动的领袖都决心从民众中间或从人的自我深处开辟一条新的得救途径。在19世纪之前,这种努力都只限于某个地区、小团体或一些个人。自19世纪开始的这个新时期,其重要特征是群众性的全体的新精神。在古代国王和家族英雄的时代,这种新精神只是像火山爆发那样偶然迸发出来(如圣方济、圣女贞德、胡斯派、罗拉派[Lollards]、路德、闵采尔之类)。在新时期里,它成为宗教热心派、民主运动、政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力。无论这些运动的领袖是品德感人的伟人 or 靠花言巧语耍手腕蛊惑人心的恶魔。

(二)从法国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欧洲国家在立法时仍宽容帮助这些民间运动的兴起。巫士不再被官方处以火刑,宗教上不信国教也不再遭受迫害。当本来潜藏在民间的运动走上地面公开化时,欧洲思想史上最惊人的一点就展现出来:尽管过去一千年里对各种“异端”迫害不遗余力,结果没有一种“异端”思想、异端哲学、异端观念被消灭。18世纪欧洲各国思想解禁后,当初在哪些国家、地区出现过的异端教派、异端思想又在原地出现了。无论是西班牙东北部的巴塞罗那,法国中部的里昂、南部图卢兹、东部的斯特拉斯堡,意大利南部拿坡里、北部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瑞士的巴塞尔、日内瓦,中欧的布拉格、克拉考,西北欧的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到处都一样。正统的世俗君王的迫害,只是把异端运动推到地下去,或采取一些伪装。对宗教性质的运动来说,政治压制只能把它们变成现实社会运动,特别是禁止教派进行宗教教育的那些地方。在有些情况下,本来是宗教性质的活动,最后变成狂热的政治运动。无论是哪种情况,被官方取缔的异端都继续存在。在西班牙和俄罗斯,自15世纪到20世纪实行的是最高压的统治,还有德国对自由教会也长期加以迫害。这些国家的经验特别引人深思。

(三)由于统治者对下层民众镇压,在欧洲各地都导致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破裂和战争。如果正统派与统治集团敢于和“敌人”对话,这种文化上的对抗本来可以温和得多。结果是只有在长期流血之后,大家才认识,谁也不能垄断真理,仿佛上帝是在某个人的掌心里。在西方的君王、神甫、政客承认自己不一定就代表真理之前,许多老百姓只好受罪。

(四)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焦虑对抗以及东西方之间日益增长的分裂状态导致欧洲在全球战争中分裂。这种焦虑紧张的气氛正助长了一种修道会式、进攻性质的政教合一教会组织的形成,就如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死后欧洲的情况那样。

(五)欧洲的正统组织只有不再怯懦地窥探对手的动向而认真面对自身的问题时,才能重新获得真正的精神力量。对罗马公教会来说,这意味着把自4世纪中断的对话重新恢复。对新教来说,这意味着要勇敢地面对现实,不怕别人提出关于基督的问题和教会传统的问题、路德和早期宗教改革的理论,以至19世纪以来对《圣经》进行历史研究带来的种种问题,不怕教条被动摇瓦解。安德烈·纪德^①曾说:“天主教徒不喜欢真理。”对一切居于正统以至非正统的教派,都是有益

^① 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

的提醒。

(六)当代各种世俗性质的哲学和思想体系无非是普通一般人的“神学”。它既是非正统圈子的神学代用品,就注定要和正统的神学对话。我们时代的唯心论、无神论、诺斯替派(gnostic)、存在主义者、唯物论者、唯灵论者,每种思想的代表都在实际上把基督教思想传统和非基督教从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思想传统放在一起进行辩论,其中有过去欧洲内在的思想对话中未曾充分考虑过的许多问题。

(七)不仅哲学家、神学家在进行这场思想竞技比赛,诗人、艺术家的作品也投入了这场思想竞技比赛,在不同的经验、思想材料、内容、形式、理论体系之间,诗歌和艺术往往能起一种独特的沟通、调和作用。

(八)现在刚开始的精神与物质的对话、空间与时间关系的对话,若没有诗人和艺术家的帮助是无法进行的。

(九)在极权压力下匆匆进行的综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神学与哲学,在某些圈子里正风行一时,但未必有真正的生命力。最杰出的科学家常常不自觉地回到古老的思想传统去。海森堡^①的“测不准原理”反映了一种德国新教非理性主义思想。爱因斯坦关于时间、空间、能与物质之间关系的统一理论(1953年),渊源于三个文化圈笼罩下的世界和中世纪西班牙哲学家拉蒙·鲁尔(Ramon Lull,约1235—1315)的著作《一般而又伟大的技艺》。爱因斯坦很可能成为一种新时代的综合理论的创始人。

(十)从每一种有重要意义的神学和哲学体系中都可以同时推论出基督教思想和反基督教思想。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儿、康德和马克思都同时既是有神论者,又是无神论者。最正统的思想家,哲学、神学上的教父们^②其思想中都包含有自身的对立面。因此,他们在自觉维护正统思想的同时,又成为异端思想的有力推动者。在欧洲曾经流行过的不遵从国教的思想体系都可以上溯思想渊源直到保罗、奥古斯丁、邓·司各特(Scotus)和爱克哈特(Eckhart)等大师。

(十一)欧洲的思想家们对他们的思想所产生的后果究竟要负多大责任?如果一个思想家的体系中有某些地方被别人拿去,造成破坏性的结果,人们于是便责备那个思想家,这似乎有欠公允。但另一方面,人们不能不对他们的思想和行

^① 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探讨量子力学,提出“测不准原理”,认为任何物体的位置与速度都难以确定,物体越小,其不确定性越大。

^② 基督教会最初5世纪中阐述基督教信仰,形成基督教教义的神学家。